政治科學論叢／第四十四期／民國 99 年 6 月／頁 75～104

頂尖兩強的雙邊關係（一六六〇至二〇〇六）

唐欣偉*

摘　要

頂尖強權間之衝突與合作，是國際關係學界的核心議題。強權戰爭往往造成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其影響範圍更遠及於交戰國疆界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鮮明的案例，而其後的美蘇對峙，也讓世界瀕臨毀滅性核戰邊緣。美蘇冷戰終結後不久，中國大陸便成爲世上僅次於美國的強權，而華府與北京之間的關係隨之變成世人關注的焦點。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能否解釋頂尖強權間的關係？

本研究檢驗了一六六〇到二〇〇六年，國際政治體系中最強的兩個國家間的衝突與合作，發現下列事實：一、第二強權與第一強權的權力比值愈大，則衝突傾向愈低。這與權力平衡論的預期相符，但與權力移轉論的預期相反。二、兩個民主強權之間的衝突傾向偏低。三、經濟發展水平愈相近，衝突傾向愈高。四、在兩強皆擁有核子武器的情形下，衝突傾向偏高。五、領土相鄰會提升衝突傾向。六、在上述五個因素中，政體與權力這兩個因素的影響力最大。

關鍵詞：權力平衡、民主和平、發展差距、核子武器、地理鄰近

---

* 佛光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E-mail: hwtang@mail.fgu.edu.tw。作者感謝國科會的補助，以及審查人的寶貴建議。
收稿日期：98 年 11 月 6 日；通過日期：99 年 5 月 20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　言

頂尖強權間之衝突與合作，向來是國際關係研究的核心議題。長年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政治體系中的第一強權。而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國力迅速提升，如今已成爲世上僅次於美國的強權。有些觀察家認爲，二〇〇九年的 G20 高峰會中，真正值得重視的只有 G2 — 美國與中國大陸（Stelzer, 2009）。[1]

不過，當前華府與北京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獨一無二的特殊事件，而有許多歷史先例可供比較。日本、蘇俄與德國都曾是中國大陸之前的體系次強，並被美國視爲主要對手。自十七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法國與西班牙、[2] 法國與俄國、法國與英國、英國與美國，先後成爲特定國際政治體系中的 G2。現有的國際關係理論，能不能妥善地解釋體系中兩個最強國家之間的衝突與合作？這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議題。

貳、觀察兩強關係的三種視角

學者們常從三種角度觀察美國與中共的關係，而這三種角度正反映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這三種國際關係的傳統研究途徑。[3]

一、從權力角度切入的現實主義觀點

第一種視角將美國與中國大陸看做國際政治體系中最強的兩個國家。兩者間的關係，與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或十九世紀後期的英美關係雷同，而這一雙強國間的權力對比，就是戰爭與和平的決定性因素。重視權力對比的國際關係學者，又分爲權力平衡論與權力移轉論兩大陣營，其中前者

---

1 晚近以 G2形容美國與中國大陸的例子還包括 Economy and Segal (2009)。

2 法國與西班牙做爲西方 G2 的時間，可以回溯到更早以前。本研究是以法國成爲第一強權的 1660 年做爲起點。

3 關於國際關係的研究途徑，請參閱蔡政文（1989）、沈玄池（2004）、李英明（2004）、朱雲漢、賈慶國（2007）、Nye (20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主張國家間的權力差距愈小，愈容易維持和平，而後者的主張正好相反。

灱權力平衡論[4]

不列顛學者在十七、十八世紀，就主張權力平衡有助於維持和平，而權力失衡則會導致戰爭（Bacon, 1625；Hobbes, 1651；Hume, 1742）。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古典現實主義的代表摩根索重新強調權力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並主張權力平衡乃是維持和平的關鍵（Morgenthau, 1948）。「各個主權國家爲了獨立的生存，各自擴大……發展與利益，在其中具有形成獨霸優勢潛力的強權逐漸興起，並試圖以擴張權力的方式來加強與維護其利益」（甘逸驊，2008：3）。

由於權力相若的兩國中之任何一國，都沒有足夠勝算發動侵略，因此戰爭不會爆發。反之，權力不平衡意味著力量較強的一方較有機會戰勝力量較弱的一方，前者將爲了增進己方利益而發動戰爭。對摩根索來說，德國權力擴張導致的失衡狀態，乃是二十世紀前期世界大戰發生的原因。總之，「權力過度集中……容易造成安全威脅……如果未能回復到平衡狀態，國際社會將趨向不穩定……容易形成紛爭與衝突」（鄭端耀，2010：1-2）。新現實主義者華爾志（Waltz, 1979）與攻勢現實主義者米爾斯海默（Mearsheimer, 2001），雖對摩根索的理論進行修正，但也都認爲權力平衡有利於和平。

牫權力移轉論[5]

有時被歸類爲現實主義一支的權力移轉理論，同樣強調權力的重要性，但主張權力平衡會導致戰爭而非促進和平（Organski, 1958；Organski and Kugler, 1980；Tammen et al., 2000；Lemke, 2002）。此派學者認爲國際體系中權力最大的國家，能在既存秩序中得到最大利益，從而成爲現狀維護者。權力最大的主導強權之相對地位愈強，戰爭爆發的機率愈低；倘若某一潛在挑戰者的權力逐漸趕上原本的主導強權，則該挑戰者便可能發動戰爭以

[4] 關於現實主義者的權力平衡論，另請參閱包宗和（2010）、明居正（2010）、廖舜右、曹雄源（2007）、Sheehan (1996)。

[5] 關於權力移轉論的相關討論與批評，另請參閱吳玉山（2010）、Chan (20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求重塑國際秩序。所以，權力平衡時，戰爭爆發的機率反而高於權力不平衡的時刻。權力移轉論者認爲，德國的權力趕上了原本的主導強權英國，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此外，普法戰爭也是發生在普魯士的權力剛趕上法國，而不是在之前兩者間的權力嚴重失衡時。[6]

除了重要歷史個案外，權力移轉論者也進行規模較大的量化分析，並找出證據支持其「權力均衡時較容易發生戰爭」的主張（Organski and Kugler, 1980；Kim, 1991, 1992, 1996, 2002；Werner and Kugler, 1996；Lemke, 2002；Efird et al., 2003）。

除了權力因素之外，權力移轉論者還提出了「對國際現狀的滿意程度」，做爲另一個解釋戰爭發生與否的變項（Organski, 1958；Tammen et al., 2000）。當原本落後的國家之權力趕上原本的主導強權時，便擁有了挑戰現狀的能力。然而該國未必有改變現狀的意願。比如說美國在權力趕過英國時，並沒有對後者發動戰爭。這是因爲與英國同爲十九世紀少數民主國家之一的美國，對「不列顛和平」感到滿意的緣故。這種重視政體性質的觀點，與自由主義學者的看法相通。

二、從政體角度切入的自由主義觀點

自由主義視角，將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看做一種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間的關係。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與二十世紀前葉的英德關係，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分析。至於決定雙邊關係良窳的關鍵則非權力對比，而是兩國是否皆爲民主政體。

一九八〇年代後，民主國家間從未發生戰爭的事實，引起了學者們的興趣。魯美爾主張自由國家間不會動用武力，而且愈自由的國家，對外動武的強度就愈低（Rummel, 1983）。雖然自由主義論者並未全盤接受魯美爾的主張，而且他們對於爲什麼會出現「民主和平」現象也有不同解釋，但都同意民主政體與和平之間明顯相關（Rummel, 1983；Chan, 1984, 1997；Maoz and Abdolali, 1989；Maoz and Russet, 1993；Ray, 1995；Russet and Oneal, 2001）。

---

[6] 關於權力平衡論與權力移轉論的綜合討論，另請參閱 Copeland（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權力移轉論者所謂「對國際現狀的滿意程度」，也可以看做是對於國際秩序合法性的接受程度；而一個國家在主觀上是否接受國際秩序的合法性，則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者關心的議題之一。合法性低的體系相當於溫特所謂的「霍布斯式」體系，合法性高的體系相當於其「康德式」體系，而介於兩者之間的則是「洛克式」體系（Wendt, 1999: 246-312）。假如體系中主導強權的政體能爲其他國家認同，該體系的合法性就比較高。依循這條思路，建構主義論者對美中關係的看法，就與自由主義者相近。

三、從發展水平角度切入的馬克思主義式觀點

第三種視角將美國看做先進的已開發國家代表，而中國大陸則是開發中國家代表。中美關係是南北關係的一環，而雙方在人均產值上的巨大差距，就是造成歧見，甚至衝突的主要原因。較富裕的一方可能爲了支配較貧困的一方而動武，至於後者也可能爲了打破被剝削的處境而開戰。這與馬克思對於階級鬥爭的看法相若，而國內外均有學者提出類似看法（Galtung, 1971；蔡東杰，2006：48）。[7]

在馬克思之後的霍布遜（Hobson, 1965）以及列寧，則主張資本主義會發展成帝國主義，而先進的帝國主義強權之間會爆發戰爭（洪鐮德，2010：9-10）。如此一來，發展程度相近的國家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會升高。這與前述「階級衝突」的情況正好相反。

上述各種變數究竟會否對頂尖強權間的衝突與合作造成影響？如果會，那又是甚麼樣的影響？本文接下來就要試著回答這兩個問題。

參、歷史經驗

一、時間範疇

前文已引述許多關於國際衝突與合作的大規模量化研究，但是這些研究的經驗基礎，幾乎都限於一八一六年之後。這段期間內的國際體系是由

[7] 關於馬克思主義式的國際關係理論，請參閱蔡政文（1989：22-39）、Zorgbibe (1995: 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相似程度頗高的英國和美國主導，其歷史經驗能推廣到何種程度，不無爭議（朱雲漢、賈慶國，2007：ii）。假如非盎格魯—薩克遜的中國大陸成爲新主導強權，屆時國際關係未必會遵循過去兩百年來的模式。本文將一六六〇年後，法國主導西方政治體系時期納入研究範圍，以擴大研究對象的異質性，提升結論說服力，而其適用於未來的可能性也更高。

二、頂尖強權間的衝突與合作

國際政治體系中頂尖兩強的衝突與合作，是本研究的依變項。當前的美國、十九世紀中期的英國、從路易十四到拿破崙統治期間的法國，都是體系中最強的主導強權。[8] 至於冷戰時期的蘇聯與如今的中國大陸，則是體系次強。

爲了確認每一時期內的頂尖兩強，必須選定國家權力的衡量標準。在對國際關係領域進行量化研究的文獻中，最常用的標準就是國內生產毛額（GDP），以及「戰爭相關計畫」（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中的國家物質力量（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指標。奧干斯基與古格勒已證明，前者比後者更適合做爲國力指標（Organski and Kugler, 1980）。經濟史家麥迪森已將世界主要國家與地區的 GDP，回溯到公元元年（Maddison, 2006, 2009），而「戰爭相關計畫」中的資料，卻從一八一六年才開始。因此本研究以麥迪森的 GDP 數據做爲一六六〇到二〇〇六年間，頂尖強權的國力指標，[9] 並以此爲基礎，將一六六〇年以來，國際體系中的頂尖強權（主導強權與第二強權）以及兩者間的戰爭整理如下表：

---

8 就地理範圍而言，英國、美國主導的都是全球體系，而法國所主導的僅限於西方世界。在法國稱霸西方時，東亞國際體系的主導強權乃是清代中國。由於法國主導的國際體系，與英美主導的國際體系有先後傳承關係，而清代中國主導的東亞國際體系則無此關係，故本文僅將法國主導時期納入討論範圍。

9 關於國力指標的選擇，請參閱陳重成、唐欣偉（2005：105-110）、Lemke (2002: 98-99)。另外，麥迪森無法提供每一個古代國家在每一年中的精確 GDP 數字。作者用內插法，依麥迪森提供的經濟成長率爲線索來推估闕漏部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　頂尖強權間的戰爭（一六六〇至二〇〇六）

時　　期	主導強權	第二強權	戰　　爭
1660～1712	法　國	西 班 牙	移轉權之戰、荷蘭戰爭、法西戰爭、九年戰爭
1713～1740		俄　國	
1741～1813		英　國	奧地利繼位戰爭、七年戰爭、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
1814～1820	英　國	法　國	
1821	法　國	英　國	
1822～1823	英　國	法　國	
1824	法　國	英　國	
1825～1865	英　國	法　國	
1866～1878		美　國	
1879～1922	美　國	英　國	
1923～1926		俄　國	
1927～1930		德　國	
1931～1940		俄　國	
1941～1944		德　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5		英　國	
1946～1986		俄　國	
1987～1991		日　本	
1992～		中國大陸	

資料來源：作者以麥迪森的資料爲基礎，再參考 McEvedy & Jones (1978) 的資料予以調整後得出。[10]

在這段期間中，法國、英國、美國都曾成爲體系主導強權，而西班牙、俄國、德國、日本與中國大陸雖非主導強權，卻先後成爲體系次強。以體系主導強權的變化爲依據，作者將一六六〇年到二〇〇六年區分爲下列三

[10] 由於麥迪森的數據是以現代而非當時的國界爲基礎，因此必須參考 McEvedy & Jones (1978) 對於古代各國人口的估計資料加以調整，然後再將各國依照 GDP 大小順序排列，得出各年度數值最高的兩個國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個時期：

灳法國主導期：一六六〇至一八一三年

1. 法西衝突與合作：一六六〇至一七一二年

法國與西班牙於一六五九年簽訂庇里牛斯和約（Peace of the Pyrenees），終結了兩國多年來的爭霸戰，並凸顯後者不再能主導西方政治。從一六六〇到一八一三年，法國一直是西方首強。[11] 十七世紀後期，法國在路易十四統治下，與不久前才從西方霸主地位跌落的西班牙[12] 發生一連串衝突。就在他剛開始親政的一六六一年，法國與西班牙的駐英大使爲爭奪先行權，在倫敦發生衝突。於是路易十四召回法國駐馬德里大使、將西班牙大使驅逐出境、中斷兩國談判，並要求西班牙道歉，否則將重啓戰端。西班牙王於次年讓步，這場糾紛才落幕（Voltaire 著，2001：97-98）。

一六六五年，法國又提供金錢與兵力，幫葡萄牙人擊敗西班牙。一六

---

[11] 麥迪森提供了 1600 年和 1700 年時法國的 GDP 數據。作者依此算出，在該世紀中法國 GDP 的年均成長率約爲 0.23%。然而麥迪森的估計是以現代法國版圖爲準。McEvedy & Jones (1978: 58-59) 指出，1700 年之際的法蘭西王國人口數，比當年居住在現今法國國界內的人口數，少 10%。此外，17 世紀的法國已佔有加拿大。在考量上述因素後，算出 1660 年路易十四親政時，包含加拿大在內的法國之 GDP 達 16,145 百萬美元，爲西方諸國之冠。1700 年到 1820 年間，法國 GDP 年均成長率約 0.5%。1760 年時加拿大爲英軍奪取，但那時法蘭西王國的疆域已和今日相埒，可以直接以麥迪森的數據爲準。到了督政府與拿破崙時代，法國又征服了比利時（1798～1813）、義大利的一部分（1803～1813）、瑞士（1804～1813）與荷蘭（1807～1813）。拿破崙失敗後，歐洲第一的位置爲英國取代。其後法國維持西方次強的地位，並曾於 1821、1824 年暫時超越英國。但是在 1860 年代，法國 GDP 又爲美國超越，此後就未曾再進入體系前兩名的位置。

[12] 在法國之前稱霸西方的西班牙，於 1660 年時除西班牙本土外，尚領有墨西哥、西屬尼德蘭（即現今之比利時）、以及約三分之一的義大利（在威尼斯、佛羅倫斯、羅馬教皇國、薩伏衣、米蘭與那不勒斯六地之中，佔有後兩者）。其中西班牙本土於 1600 至 1700 年間年均 GDP 成長率約 0.06%、墨西哥約 0.82%、西屬尼德蘭約 0.34%、義大利則約 0.02%。西班牙王轄地的 GDP 總值，在 1660 年時爲 15,955.02 百萬美元，相當於當年法國的 98.82%，居西方第二位。到了下一個世紀，西班牙本土的增長率約 0.42%、墨西哥約 0.56%、西屬尼德蘭約 0.57%，而義大利則約爲 0.4%。在 1713 年結束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烏特勒支條約中，西班牙割讓了在尼德蘭與義大利的屬地，其 GDP 總值便爲俄國與英國超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六七年，法王進攻屬於西班牙的尼德蘭地區，連連取勝，奪取不少邊境土地。荷蘭、英國與瑞典結盟並出面斡旋，才終結了這場戰爭。法國與西班牙於一六六八年簽訂亞琛條約（Treaty of Aachen），前者歸還部分土地，但保留數個奪自西班牙的軍事要塞。

下一場法西衝突起於一六七三年。此前一年，法國進攻荷蘭，幾乎將後者完全消滅。西班牙協助荷蘭，與法國在西歐陸地和地中海展開戰鬥。一六七八年，交戰各方簽訂奈美根條約（Treaties of Nijmegen），西班牙又將部分邊境領土割給法國。

西屬尼德蘭於一六八二年再次遭到法國攻擊。西班牙的盟友神聖羅馬帝國無法提供有效援助，而盧森堡被法國奪取。一六八四年，法國、西班牙與神聖羅馬帝國簽訂爲期二十年的休戰協定。不過路易十四又於一六八八年入侵帝國屬地。神聖羅馬帝國與西班牙、英國、荷蘭等國結盟，與法國展開一場長達九年的戰爭。一六九七年，交戰各方在雷斯維克（Ryswick）達成協定，法國歸還大部分自奈美根條約締結後所侵佔的土地，西班牙也取回盧森堡。[13]

在路易十四晚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中，法國與西班牙轉而聯手對抗其他歐洲列強組成的聯盟。當西班牙於一七一三年簽訂的烏特勒支條約（Treaty of Utrecht）中放棄其在尼德蘭與義大利的屬地後，西方第二強權的地位，就被彼得大帝的俄國取代。

2. 法俄對峙：一七一三至一七四〇年

當西歐各國爲了西班牙王位問題激鬥時，俄國[14] 在東歐擊敗了區域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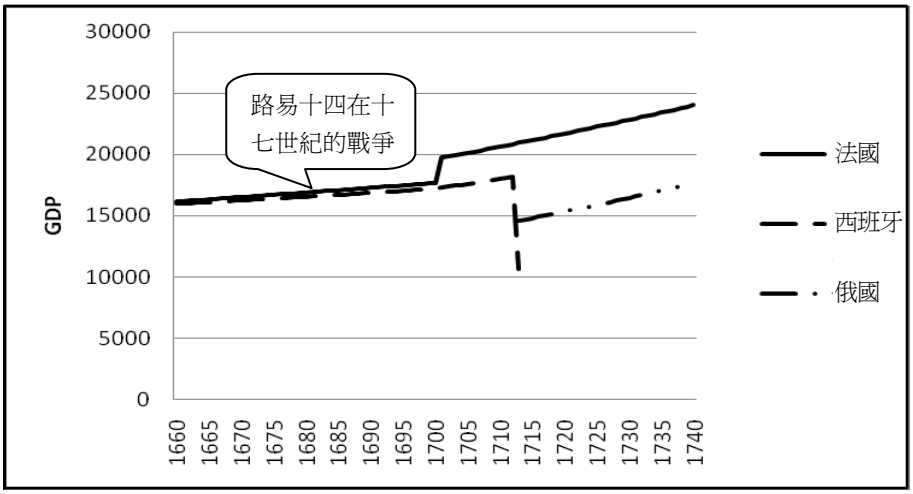
[13] 關於路易十四在 17 世紀後期的外交與軍事行動，包括 1667～1668 年的「移轉權之戰」、1672～1678 年的「荷蘭戰爭」、1682～1684 年的「法西戰爭」，以及 1688～1697 年的「奧格斯堡同盟戰爭」（又名九年戰爭），請參閱方真真、方淑如（2005：93）、陳文海（2004：186-189）、Voltaire 著（2001：105-228）、Shennan 著（1999：105-130）。

[14] 依據麥迪森的數據計算，前蘇聯地區於 1700 年到 1800 年間的 GDP 平均年增率約 0.71%。但是當年沙俄的領土小於日後的蘇聯。在參考了 McEvedy & Jones (1978: 78-82, 157-163) 以及賀允宜（2004：351）的著作後，作者於 1856 年前蘇聯地區的 GDP 數值乘以 37/45，以扣除尚未納入俄國版圖的高加索與土耳其斯坦地區之數值。自 1857 年起，因爲高加索已完全被兼併，故改將前蘇聯地區的 GDP 數值乘以 39/45。從 1901 年開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權瑞典，隱然與西側的權力中心分庭抗禮，甚至使得原本敵對的西歐列強，轉而聯手對付俄國（Lindsay 著，1999：250-255）。法國的盟友瑞典、波蘭、土耳其，從前是俄國邊患，如今則變成俄國擴張的目標。不過法國與俄國這兩個頂尖強權間，從未全面開戰，而僅於一七三三年爆發的波蘭王位繼承戰爭中小規模交鋒。[15] 一七三六至一七三九年間，俄土戰爭爆發。俄國在接到法國出兵干涉的威脅後停戰（賀允宜，2004：228），而後俄國便暫時退出頂尖強權的行列。

圖 1　頂尖強權的 GDP (1660-1740)



資料來源：請參閱註 11～14。國內生產毛額的單位爲百萬國際美元（下同）。假設各個國家與地區的國內生產毛額，在一六〇〇至一七〇〇年間的年均增長率，和整個十七世紀的年均增長率相等，其中法國本土約 0.23%、加拿大約−0.15%、西班牙約 0.06%、墨西哥約 0.82%、比利時約 0.34%、義大利約 0.02%。西班牙的資料迄於 1713 年，而俄國的資料則始於該年。

土耳其斯坦地區也完全納入版圖，便直接以前蘇聯地區的 GDP 計算。另外芬蘭（1809～1917）與議會波蘭（Congress Poland，自麥迪森提供波蘭數據的 1870 年起，至 191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爲止）的數據，也併入沙俄的數值計算，其中議會波蘭的數據，在參考 McEvedy & Jones (1978: 74-77) 資料後，認定其於 1870～1875 年間相當於麥迪森提供之波蘭（以現今疆域爲準）GDP 的 9/13，於 1876～1913 年間則爲 3/4。1741 年，英國取代了俄國歐洲次強的地位，但後者於 1923～1926、1931～1940 與 1946～1986 年間，再度成爲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強權。

[15] 這場戰爭的始末，請參閱賀允宜（2004：227-228）、Shennan 著（2000：87-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 法英爭霸：一七四一至一八一三年

自一七四一年起，英國便凌駕俄國，成爲西方次強。[16] 此時法國與英國在奧地利繼位戰爭中正面交戰，直到一七四八年簽訂亞琛條約爲止，雙方皆無所獲。一七五六年，七年戰爭爆發，法英兩強在歐、亞、美洲展開戰鬥。到了一七六三年，英國大勝，將法國勢力逐出北美與印度。然而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與英國政府間的關係，卻漸趨惡化，終於在一七七六年宣布獨立並與英軍交戰。法國於一七七八年正式出兵支援北美殖民地。一七八三年，英國承認失敗，與美、法締和。

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耗費大量資源的法國，於一七八九年爆發革命。國王路易十六在一七九三年被處死，而英國便驅逐法國駐倫敦大使。法國正式向英國宣戰。英國領導的第一次反法同盟與法國開戰，然而同盟中的普魯士、荷蘭、西班牙、奧地利等國相繼退出戰局，英國也於一七九七年向法國求和。

一七九八年，法國向埃及等地發動侵略，英、奧等國於次年組成第二次反法同盟。從一七九九年起，到拿破崙於一八一五年被徹底擊敗爲止，英法兩國年年都處於交戰狀態。[17] 不過在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從俄國敗退後，法國霸權的地位便搖搖欲墜。到了一八一四年，退回原有疆界的法國之 GDP 已經爲英國超越。

牠英國主導期：一八一四至一八七七年

1. 英法爭霸：一八一四至一八六五年

儘管英國於一八一四年取代了法國，成爲西方第一強權，但後者仍然保持頂尖兩強之一的地位，甚至曾短期凌駕英國。在這段「歐洲協調」大

[16] 自 1700 年至 1820 年間，不列顛 GDP 的年均增長率約 1.02%。包括北美十三州（至 1775 年美國獨立前夕爲止）、加拿大（1761～1918）、澳洲（1770～1918）、紐西蘭（1840～1918）等西方延伸地區在內的英帝國，於 1741～1922 年間，始終爲體系內前兩名的強權，並在 1814～1878 年間成爲主導強權（但 1821、1824 年間爲法國超越）。1945 年時，英國一度恢復第二強權的地位。

[17] 儘管英法兩國於 1802 年 3 月簽訂亞眠和約（Peace of Amien），然而次年又兵戎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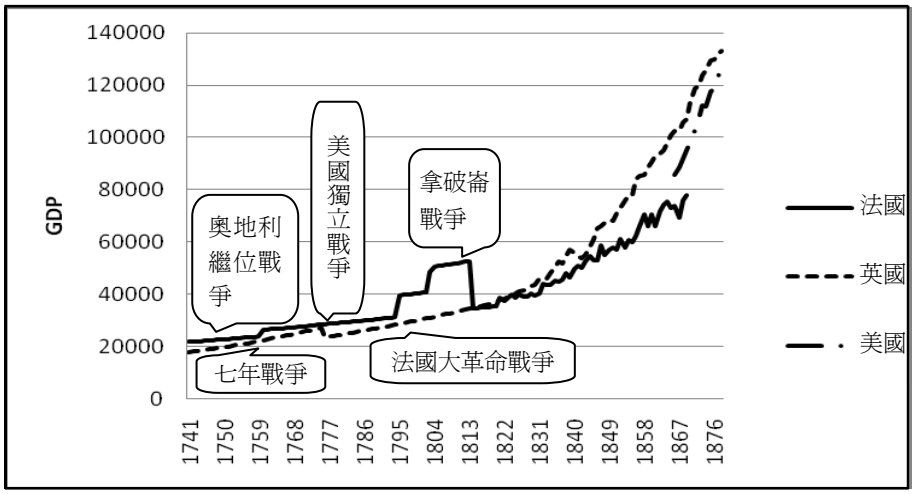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致運作順暢的期間，西方列強間的和平得以維持。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間的克里米亞戰爭是唯一例外，但英法兩強在該戰爭中站在同一陣線，聯手對抗俄國。

2. 美國崛起：一八六六至一八七七年

一七七六年宣布脫離英國獨立的美國，成長速度非常快。[18] 一八六〇年時，美國的 GDP 已經幾乎與法國相當。[19] 儘管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間的內戰造成巨大損失，美國仍然迅速超越法國，成爲體系第二強權。

圖 2　頂尖強權的 GDP (1741-1878)



資料來源：以 Maddison (2009) 之資料爲基礎繪製。其中英國的生產毛額尚包括本土以外之北美十三州（至一七七五年爲止）與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在內。

犴美國主導期：一八七九年以後

1. 英俄稱霸舊大陸：一八七九至一九二六年

自一八七九年起，美國的 GDP 就凌駕英帝國，成爲體系第一強權。這段期間內，美英兩國曾發生衝突。其中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年間的委內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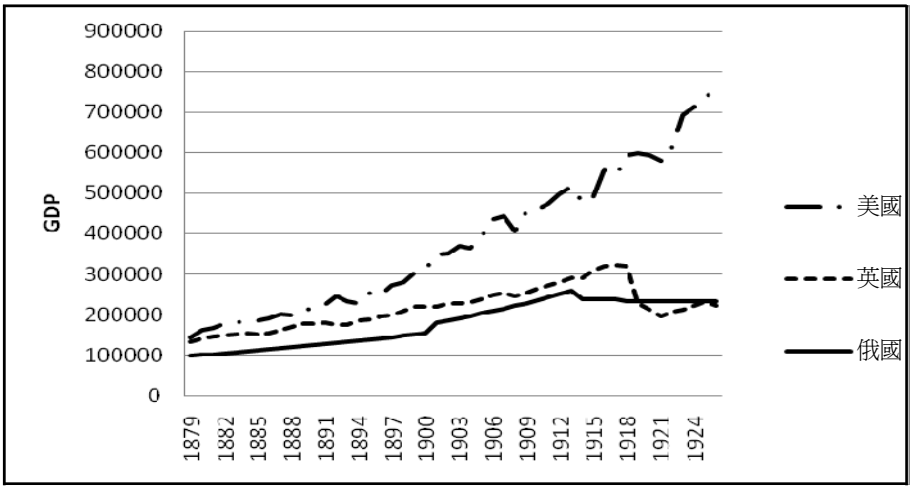
[18] 從 1820 年到 2006 年，美國 GDP 的年均成長率略高於 3.61%。
[19] 根據麥迪森的資料，該年美國的 GDP 約爲法國的 98.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拉債務危機，更使兩國瀕臨開戰邊緣。不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英聯手擊敗德國。在結束一戰的國際條約中，加拿大、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等英帝國自治領皆以獨立地位簽字。這意味著付出沉重戰爭代價的英國，已不再能支配歐洲以外的白人自治領。

在一戰時損失更慘重的俄國，於一九一七年爆發革命，隨後又發生內戰。然而俄國於內戰結束後，又躍居英國之上，成爲歐亞首強，以及國際體系第二強權。在這段期間內，頂尖強權之間也沒有發生任何戰爭。[20]

圖 3　頂尖強權的 GDP (1879-1926)



資料來源：以 Maddison (2009) 之資料爲基礎繪製。其中一八七九至一九一八年間英國的生產毛額包括本土以外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在內。

2. 德俄逐鹿歐洲：一九二七至一九四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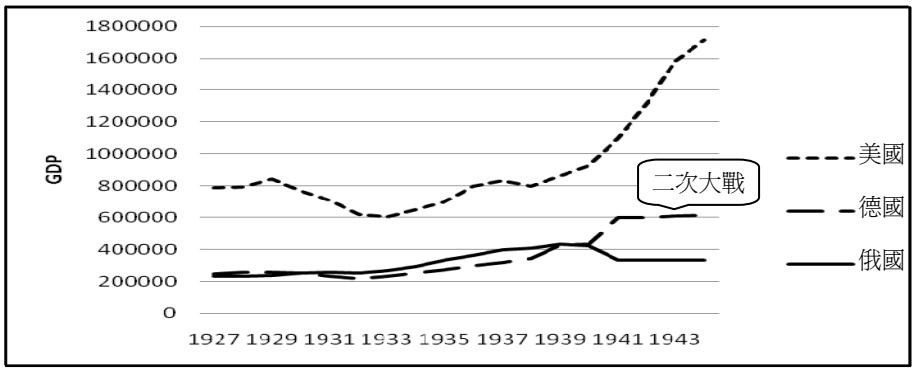
德國於一八七一年統一後，與英國實力的差距便逐漸縮小。到了威瑪共和時期，德國終於攀升到世界第二。但是在經濟大恐慌的衝擊後，德國又被蘇俄超越。不論是採行民主政體的威瑪德國，或是極權專制的共產蘇俄，都沒有和世上最強的美國發生衝突。直到希特勒透過對外兼併，讓德國國力再次超越蘇俄後，美國與德國間的大戰才於一九四一年爆發。一九

[20] 美國曾出兵干預俄國內戰，但內戰中的俄國並非頂尖強權，而且美國的干預也還不到正式參戰的程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五年德國戰敗，不僅喪師失地，甚至陷入國家分裂的局面，此後再也未能重回體系第二強權之位。

圖 4　頂尖強權的 GDP (1927-1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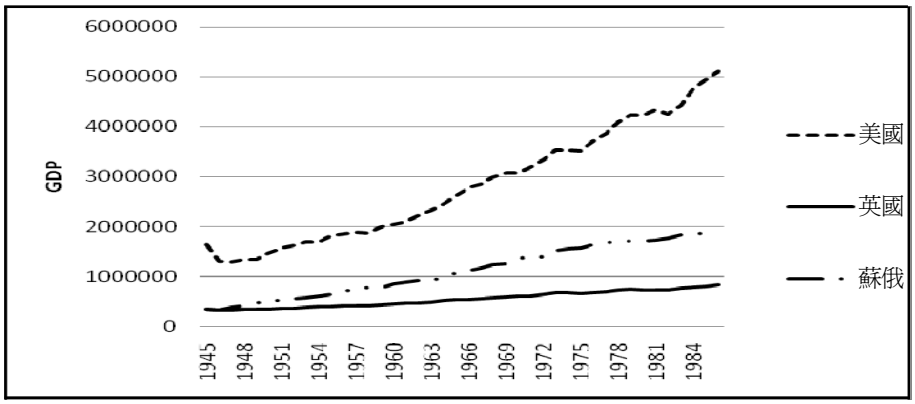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以 Maddison (2009) 之資料爲基礎繪製。

3. 美蘇冷戰：一九四五至一九八六

除了美國之外，英國在二戰中受到的損害在列強之中相對較小，從而於一九四五年短暫地回到世界第二的位置。蘇聯復原後，英國便徹底退出頂尖強權之林。此後約四十年，就是美蘇兩強持續緊張對立，但又沒有正面交戰的冷戰期。

圖 5　頂尖強權的 GDP (1945-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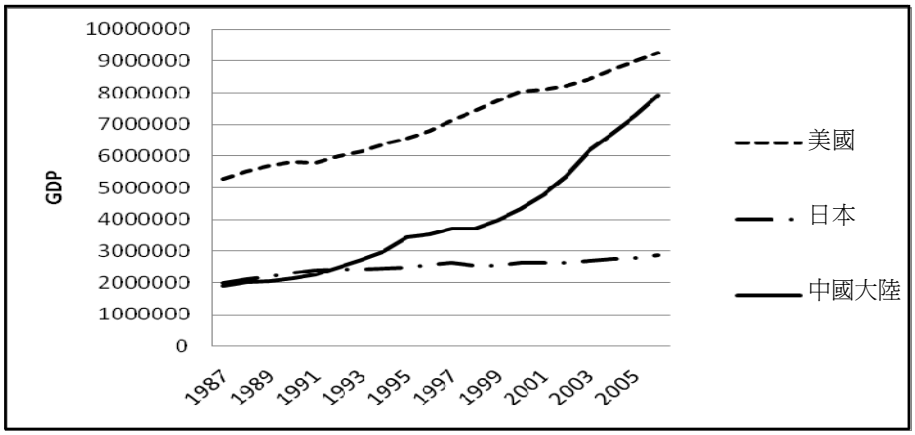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依據 Maddison (2009) 之資料繪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 亞洲復興：一九八七至二〇〇六

依據 Maddison (2009) 的資料，早在蘇聯瓦解前的一九八七年，日本以購買力平價算出的 GDP 就已躍居世界第二，並被部分美國人視爲威脅（Friedman, 1991）。到了一九九二年，日本的位置被中國大陸取代，而後者持續高速成長，至二〇〇五年時，GDP 已超過美國的 80%。從前的俄國、德國或日本都做不到這點。

圖 6　頂尖強權的 GDP (1987-2006)



資料來源：依據 Maddison (2009) 之資料繪製。

儘管中國大陸擁有核子嚇阻能力，但是一九九二年以來的美中關係卻不如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一年間的美日關係和諧。華府與東京間沒有任何軍事性糾紛，但與北京之間卻發生了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六年間的台海危機、一九九九年美軍炸毀中共駐南斯拉夫使館，以及二〇〇一年的南海撞機等事件。其中後兩次事件都造成中共人員喪生。核子武器的嚇阻力無從解釋此一差異，但不論從權力對比、政體異同或經濟發展水平的對比，都可以解釋上述現象：美國與日本間的權力差距大、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又同屬民主政體，從而容易維持和平；至於美國與中國大陸間的情形剛好相反。然而這三個變項在解釋之前的歷史經驗時，都會遭遇困難。比如說，美國與德國間的權力差距，比美日間的權力差距更大，然而前者的衝突傾向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八組雙邊關係中最高者；[21] 一七一三至一七四〇年間的法國與俄國皆非民主國家，但兩者之間的衝突傾向卻很低；一六六〇至一七一二年間的法國與西班牙，經濟發展水平非常接近，其衝突傾向卻很高。可見單憑少量的研究樣本，很難得出具有廣泛適用性的結論，其研究成果的預測能力也容易受到質疑。

肆、量化分析

爲了將前述將近三個半世紀的歷史經驗加以整合，檢視權力對比、民主政體與發展水平對比，究竟對不同時代的頂尖強權間之衝突有何影響，本節將以推論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一、依變項

確認了一六六〇至二〇〇六年間，每一年的體系兩大頂尖強權後，就要將這一對國家在每個給定年份的關係量化登錄。傳統做法是將雙邊關係區分爲有戰爭與沒有戰爭兩種情形，令前者爲 1，後者爲 0，再以 Logit 分析法處理。[22] 更進一步的做法，是把兩國間的關係轉化爲定距資料（interval data）。本研究便採新近發展出的衝突與整合量標，以 0～8 之間的數據來表示雙邊關係，其中 0 代表充分整合，4 代表沒有整合也沒有武裝衝突，而 8 則代表戰爭。從 4～0 之間的數值代表程度逐漸加深的跨國整合，而 4～8 之間的數值則代表強度逐漸升高的跨國軍事化糾紛（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MID）（Efrid et al., 2003）。[23]

---

[21] 在此比較的是 1927～1930、1941～1944 年間之美德關係與 1987～1991 年間之美日關係。

[22] 例如 Lemke (2002)。

[23] 1660～1815 年的資料，來自於前述各歷史學者的研究成果。1816 以後的資料，主要來自 Bennett and Stam (2000) 以及 Ghosn and Bennett (2003)。由於頂尖強權間的整合很少發生，衝突與整合量標的數值很少低於 4。1989～1991 年的美日關係，以及 1992～1993、1997～1998、2002～2006 年間的美中關係，由於 APEC 之故，給定的數值爲 3.7336。當美中之間發生軍事性糾紛時，代表雙邊關係的數值便高於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自變項

灱權力對比

權力比值＝第二強權之 GDP／第一強權之 GDP。

理論上，這個數值的上限爲 1（當這兩個強權的 GDP 完全相同時），下限爲 0（假如第二強權的 GDP 值爲 0）。[24]

牣民主政體

若兩大頂尖強權皆爲民主政體，此變項之數值爲 1；否則爲 0。本文以 Polity IV 資料庫爲準（Marshall and Jaggers, 2009），一國在該資料庫中，polity 2 的數值爲正，方爲民主國家。[25]

犴經濟發展水平的對比

經濟發展水平對比＝兩國間人均 GDP 較低者之人均 GDP／較高者之人均 GDP。和權力對比變項一樣，這個數值也在 0 與 1 之間變動。較大的數值代表兩國的發展水平較接近，而數值 1 表示兩國的發展水平完全相等。人均 GDP 數值的資料來自於 Maddison (2009)。

犵核子嚇阻

這是本研究中採用的第一個控制變項。許多學者都認爲核子嚇阻有助於避免衝突（Waltz, 1979: Ch8；Mearsheimer, 2001: 358），[26] 所以本研究將

---

[24] 實際資料來源與表 1 相同。

[25] 其他諸如 Chan (1984)、Doyle (1983, 1986)、Bollen (1990)、Vanhanen (2000)，以及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http://freedomhouse.org），也提供了民主國家的判準。各判準指標雖有所不同，但彼此相關性很高（Vanhanen, 2000；Feng, 2003）。但是 Polity IV 資料庫涵蓋的資料年限爲 1800～2008，爲各種可選擇之資料庫中期間最長者，最符合本研究所需。1800 年前各頂尖強權皆非民主國家，該變項之數值皆爲 0。

[26] 另可參閱 Zorgbibe (1995: 3)。Mearsheimer 認爲核子武器有助於維持和平，也曾對國際體系的級性、權力是否平衡，以及戰爭發生的頻率進行分析，卻沒有將核武與其他變數整合在同一個模式中進行分析（2001：356-358）。在核子武器發明之前，此變項的數值自然爲 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列爲控制變項。當兩國皆有核武時，此變項數值登錄爲 1；否則爲 0。實際上，僅有一九五〇至一九八六年間的美俄關係，以及一九九二至二〇〇六年的美中關係符合此條件。

玎相鄰與否

領土糾紛常被認爲是引發戰爭的原因（Holsti, 1991），因此本研究將兩國相鄰與否，納爲第二個控制變項。兩國相鄰時，被賦予數值 1，反之則被賦予數值 0。在本文探究的八對頂尖強權中，唯有法國與西班牙的本土接壤。法國與英國本土間僅隔著狹窄的海峽，而且英法殖民地間又有漫長的共同邊界，所以被認定爲相鄰。在加拿大脫離英國獨立之前，英國與美國也被認定爲相鄰。

表 2 到表 10 就是依據上述準則處理所得的敘述統計結果：

表 2　影響頂尖強權間之衝突與整合的因素之統計數據

變　　數	平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標 準 差
衝突與整合	5.2163	3.7336	8	1.7579
權 力 比 值	0.7451	0.2110	0.9923	0.2182
皆 爲 民 主	0.2017	0	1	0.4019
發展水平比值	0.6693	0.0915	0.9970	0.2319
皆 有 核 武	0.1499	0	1	0.3574
領 土 相 鄰	0.6657	0	1	0.4724
觀察值：347；期間：1660～2006 年				

表 3　影響法國與西班牙間之衝突與整合的因素之統計數據

變　　數	平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標 準 差
衝突與整合	5.7977	4	8	1.9490
權 力 比 值	0.9778	0.9675	0.9882	0.0057
皆 爲 民 主	0	0	0	0
發展水平比值	0.9487	0.9677	0.9328	0.0108
皆 有 核 武	0	0	0	0
領 土 相 鄰	1	1	1	0
觀察值：53；期間：1660～1712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4　影響法國與俄國間之衝突與整合的因素之統計數據

變數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標準差
衝突與整合	4.2014	4	7.32	0.7520
權力比值	0.7945	0.7734	0.8159	0.0129
皆爲民主	0	0	0	0
發展水平比值	0.6558	0. 6484	0.6633	0.0046
皆有核武	0	0	0	0
領土相鄰	0	0	0	0
觀察值：28；期間：1713～1740 年				

表 5　影響法國與英國間之衝突與整合的因素之統計數據

變數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標準差
衝突與整合	5.376	4	8	1.9078
權力比值	0.8589	0.6355	0.9923	0.0857
皆爲民主	0.024	0	1	0.1537
發展水平比值	0.6774	0. 4201	0.7882	0.0537
皆有核武	0	0	0	0
領土相鄰	1	1	1	0
觀察值：125；期間：1741～1865				

表 6　影響英國與美國間之衝突與整合的因素之統計數據

變數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標準差
衝突與整合	4.1669	4	7.32	0.7276
權力比值	0.7153	0.2110	0.9606	0.1620
皆爲民主	1	1	1	0
發展水平比值	0.8730	0. 6026	0.9970	0.0748
皆有核武	0	0	0	0
領土相鄰	0.9138	0	1	0.2577
觀察值：58；期間：1866～1922、19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7 影響美國與俄國間之衝突與整合的因素之統計數據

變數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標準差
衝突與整合	5.9658	4	7.32	1.5917
權力比值	0.3967	0.2549	0.5069	0.0495
皆爲民主	0	0	0	0
發展水平比值	0.3206	0. 2080	0.3767	0.0362
皆有核武	0.6727	0	1	0.4507
領土相鄰	0	0	0	0
觀察值：55；期間：1923～1926 年、1931～1940 年、1946～1986 年				

表 8 影響美國與德國間之衝突與整合的因素之統計數據

變數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標準差
衝突與整合	6	4	8	2.1381
權力比值	0.3769	0.3054	0.5439	0.0827
皆爲民主	0.5	0	1	0.5345
發展水平比值	0.5923	0. 4933	0.6960	0.0658
皆有核武	0	0	0	0
領土相鄰	0	0	0	0
觀察值：8；期間：1927～1930 年、1941～1944 年				

表 9 美國與日本間之衝突與整合的因素之統計數據

變數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標準差
衝突與整合	3.8402	3.7336	4	0.1459
權力比值	0.3917	0.3751	0.4142	0.0155
皆爲民主	1	1	1	0
發展水平比值	0.7889	0. 7459	0.8471	0.0400
皆有核武	0	0	0	0
領土相鄰	0	0	0	0
觀察值：5；期間：1987～1991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0　美國與中國大陸間之衝突與整合的因素之統計數據

變數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標準差
衝突與整合	5.0748	3.7336	7.32	1.7017
權力比值	0.5900	0.4150	0.8556	0.1392
皆爲民主	0	0	0	0
發展水平比值	0.1320	0. 0915	0.1948	0.0326
皆有核武	1	1	1	0
領土相鄰	0	0	0	0
觀察值：15；期間：1992～2006 年				

三、迴歸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複迴歸模型，同時納入權力比值、民主政體、發展水平對比等三個主要自變項，以及核子嚇阻和相鄰與否這兩個控制變項。以統計軟體 STATA 對前述資料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這五個變項，在統計上都與頂尖強權間的衝突與整合顯著相關（表 11）。

權力比值變項的係數約爲 –4.04，意味在其他變數保持不變的條件下，權力比值增加一單位，衝突與整合量標就減少約 4.04 單位。權力比值愈大，表示雙方的權力愈平衡。衝突與整合量標數值減少，表示從衝突走向合作。因此，這個結果支持權力平衡論，而與權力移轉論的預期相反。

民主政體變項的係數約爲 –2.22，意味在其他變數保持不變的條件下，兩國皆爲民主政體時，衝突與整合量標就會減少約 2.22 單位。這和民主和平論的預期一致。

發展水平對比變項的係數約爲 1.83，意味在其他變數保持不變的條件下，兩國經濟發展水平的相似程度每增加一單位，衝突與整合量標就會增加約 1.83 單位。這表示經濟發展水平愈接近，衝突傾向愈強。此一發現與馬克思主義式的階級衝突論正好相反，卻與霍布遜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衝突論吻合。不過此自變項的統計顯著性，遠低於其他四個自變項。

核子武器變項的係數約爲 1.68，意味在其他變數保持不變的條件下，兩國皆有嚇子嚇阻能力時，衝突與整合量標就會增加約 1.68 單位。這與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子嚇阻有助於維護和平的論點正好相反。

領土相鄰變項的係數約爲 1.67，意味在其他變數保持不變的條件下，兩國相鄰會使衝突與整合量標增加約 1.67 單位，顯示出領土相鄰的頂尖強權間，衝突傾向高於領土不相鄰者。

表 11　影響頂尖強權間之衝突與合作的因素之迴歸分析結果（Random Effect）

權力比值	–4.0394*** (0.9058)
民主政體	–2.2175*** (0.4845)
發展水平	1.8304†　(1.0239)
核子武器	1.6802*** (0.3920)
領土相鄰	1.6717**　(0.5773)
常數項	6.1711*** (0.5773)
觀察值	347
Wald chi2	53.79***
Overall R-sq	0.2268

註：括號內數值爲標準誤。†表示 p<0.1，*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表 12 顯示出各自變項的 Beta 值與其標準差的乘積。該乘積表示各自變項變動一個標準差時，對於依變項的影響。比較該乘積絕對值的大小，可以看出那一個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最大。在五個自變項中，自由主義者重視的是否皆爲民主政體，以及現實主義者重視的權力比值，對於頂尖強權間的衝突與合作之影響最大。至於馬克思主義者強調的發展水平變數，影響力不及前兩者中任何一項變數之半，也低於領土鄰近性或核子武器的影響力。

表 12　自變項影響力大小之比較

自變項	Beta 值（一）	標準差（二）	（一）x（二）
權力比值	–4.0394	0.2182	–0.8814
民主政體	–2.2175	0.4019	–0.8912
發展水平	1.8304	0.2319	0.4245
核子武器	1.6802	0.3574	0.60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領土相鄰	1.6717	0.4724	0.78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伍、結　論

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在於將頂尖強權的雙邊關係之量化研究的時間範疇，從十九世紀回溯至十七世紀中葉，以含括非盎格魯—薩克遜強權主導國際體系的時期，並找到支持自由主義中的民主和平論與現實主義中的權力平衡論的證據。除了民主政體與權力對比這兩個最主要的因素以外，經濟發展水平的相似性、核子武器，以及領土相鄰，也都會增加衝突傾向。因此本研究的結果，與核子嚇阻會迫使各國進行合作的論述正好相反。

在五個對頂尖強權間的衝突與合作造成影響的變數之中，兩國是否皆爲民主政體，以及權力分配這兩者的影響力最大，肯定了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這兩個傳統研究途徑的解釋能力。至於冷戰時期發展出來的核武嚇阻理論，與本研究結果不一致，這點值得進一步思考。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Lindsay, J. O. 著，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組譯，1999，《新編劍橋世界現代史第七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譯自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hennan, J. H. 著，李寧怡譯，1999，《路易十四》。台北：麥田。譯自 *Louis XIV*. London: Routledge. 1997.

Shennan, J. H. 著，鄭明萱譯，2000，《十八世紀的歐洲情勢》，台北：麥田。譯自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1689-1789*. London: Routledge. 1995.

Voltaire 著，吳模信、沈懷潔、梁守鏘譯，2001，《路易十四時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譯自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Paris. 1756.

Zorgbibe, Charles 著，胡祖慶譯，1995，《國際關係》，台北：五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譯自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5.

方真真、方淑如編著，2005，《西班牙史》，台北：三民。

包宗和，2010，〈結構現實主義的論點、辯述與反思〉，「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論文（5 月 21 日），台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甘逸驊，2008，〈歐盟與美國的權力關係：「柔性平衡」的適用性〉，《問題與研究》，47(2): 1-24。

朱雲漢、賈慶國主編，2007，《從國際關係理論看中國崛起》，台北：五南。

吳玉山，2010，〈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論文（5 月 22 日），台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沈玄池，2004，《國際關係》，台北：高立。

李英明，2004，《國際關係理論的啓蒙與反思》，台北：揚智文化。

明居正，2010，〈古典現實主義之反思〉，「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論文（5 月 21 日），台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洪鐮德，2010，〈馬克思主義與國際關係的理論—歷史的回顧與當前的論述〉，「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論文（5 月 22 日），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陳文海，2004，《法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陳重成、唐欣偉，2005，〈中國大陸崛起對當前國際體系的衝擊〉，《遠景基金會季刊》，6(4)：101-131。

賀允宜，2004，《俄國史》，台北：三民。

蔡政文，1989，《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及其評估》，台北：三民。

蔡東杰，2006，《西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

廖舜右、曹雄源，2007，〈現實主義〉，張亞中（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台北：揚智文化，頁 37-71。

鄭端耀，2010，〈搶救權力平衡理論〉，「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文（5 月 21 日），台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二、英文部分

Bacon, Francis. 1625. “Of Empire.” In *Essays*. London: Iohn Haviland for Hanna Barret.

Bennett, D. Scott and Allen Stam. 2000. “EUGene: A Conceptual Manual.”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6:179-204.

Bollen, Kenneth A. 1990. “Political Democracy: 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Trap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5(1): 7-24.

Copeland, Dale C. 2000.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han, Steve. 1984.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Are the Freer Countries More Pacific?”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8(4): 617-648.

Chan, Steve. 1997. “In Searc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Problems and Promise.”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1(1): 59-92.

Chan, Steve. 2008. *China, the U.S., 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London: Routledge.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3): 205-235.

Doyle, Michael W.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4): 1151-1169.

Economy, Elizabeth C. and Adam Segal. 2009. “The G-2 Mirage.” *Foreign Affairs* 88(3): 14-23.

Efird, Brian, Jacek Kugler and Gaspare M. Genna. 2003. “From War to Integration: Generalizing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9(4): 293-313.

Feng, Yi. 2003.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MIT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iedman, G. and M. LeBard. 1991. *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Galtung, Johan. 1971.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8(2): 81-117.

Ghosn, Faten and Scott Bennett. 2003. *Codebook for the Dyadic Militarized Interstate Incident Data*, Version 3.10 in http://cow2.la.psu.edu. Latest updated 1 November 2009.

Hobbes, Thomas. 1651.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ecclesiasticall and Civil*. London: Printed for Andrew Crooke.

Holsti, Kalevij. 1991. *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bson, John A. 1965. *Imperialism*. 2nd ed.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Hume, David. 1742.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cy*. 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 ed. Eugene F. Miller. 1987. in http://www.econlib.org/library/LFBooks/Hume/hmMPL30.html. Latest updated 1 November 2009.

Kim, Woosang. 1991.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4): 833-50.

Kim, Woosang. 1992. "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from Westphalia to Waterloo." *World Politics* 45(1): 153-172.

Kim, Woosang. 1996. "Power Parity, Alliance, and War from 1648-1975." In *Parity and War*, eds.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93-106.

Kim, Woosang. 2002. "Power Parity, Alliance, Dissatisfaction, and Wars in East Asia, 1860-1993."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6(5): 654-671.

Lemke, Douglas. 2002.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ddison, Angus. 2006.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OECD.

Maddison, Angus. 2009.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6 AD.” in http://www.ggdc.net/maddison/. Latest updated 1 November 2009.

Maoz, Zeev and Nasrin Abdolali. 1989. “Regime Typ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817-1976.”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3(1): 3-35.

Maoz, Zeev and Bruce Russet. 1993.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l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3): 624-638.

Marshall, Monty G. and Keith Jaggers. 2009. “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08.” in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Latest updated 1 November 2009.

McEvedy, Colin and Richard Jones. 1978. *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 New York: Facts on File.

Mearsheimer, John.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Morgenthau, Hans. 194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1st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Nye, Joseph. 2007.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6th edition.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Organski, A. F. K. 1958. *World Politics*, 1st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Organski, A. F. K. and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y, J. L. 1995.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Rummel, R. J. 1983. “Libertarianism and International Viol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7(1): 27-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ussett, Bruce and John R. Oneal. 2001.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orton.

Sheehan, Michael. 1996.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Stelzer, Irwin. 2009. "The Real Action Will Be at the G2: China and the US." in http://business.timesonline.co.uk/tol/business/columnists/article5993143.ece. Latest updated 1 November 2009.

Tammen, Ronald et al. 2000.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ing.

Vanhanen, Tatu. 2000. "A New Dataset for Measuring Democracy, 1810-1998."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7(2): 251-265.

Waltz, Kenneth.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Pub.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rner, Suzanne and Jacek Kugler. 1996. "Power Transitions and Military Buildups: Resol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ms Buildups and War." In *Parity and War*, eds.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eatest Powers (1660-2006)

*Hsin-wei Tang**

Abstract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most powerful countries is a core issue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war between two powerful nations usually causes serious loss of life and property, with further implications far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combatant states. The Second World War is a vivid example, and the subsequent U.S.-Soviet rivalry led the world to the brink of nuclear destruction. Not long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Union, China became the second strongest power in the world, with overall national capabilities inferior only to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su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is the central focu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oday. Can traditional IR theories adequately explain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greatest powers"?

By examining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most powerful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from 1660 to 2006, the author finds the following: first, the higher the power ratio between the second largest power and the largest one, the lower the tendency for conflict between them. This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balance-of-power theory, but contradicts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Second, the tendency to conflict between two democratic powers is low. Third, a lower economic developmental gap leads to a higher tendency to conflict. Fourth, the tendency to conflict is high between two nuclear powers. Fifth, geographic proximity increases the tendency to conflict. Sixth, among the above five factors, relative power and regime typ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Keywords: Balance of Power, Democratic Peace, Developmental Gap, Nuclear Weapons, Geographic Proximity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o Guang University. E-mail:hwtang@mail.fg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